题材意识与个人经验

□计文君

题材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小说家来说，是个冤孽纠缠的老问题。

1932年，两个四川年轻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沙汀、艾芜和鲁迅之间往来的这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年轻的小说作者这样表达他们的困惑："我们曾着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的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这须得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这个在1932年提出的问题，到了2013年，是否还是问题？

作为左翼文学青年，当年的沙汀和艾芜对于只能书写个人经验感到焦灼和羞愧。他们热切追求作品的社会意义，渴望书写属于"时代大潮流"的题材——当然，他们对于这个大潮流有着明确的判断和认识，那就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社会革命。这样的题材意识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是非功过，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予以评说的。对"写什么"如此重视，体现着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主动担负民族文化命运，自觉推动社会变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文学蒙上了功利主义色彩。将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生活中，在"写什么"这个问题的追光下，扮演过无数让人一言难尽的悲喜剧。

经由高度政治化和充分商品化的社会转型之后，经由现代的分崩离析和后现代的拆解粉碎之后，"主流"、"本质"、"意义"之类的概念，在很多人眼里都变得无比可疑。作为今天的常识，书写个人经验是作家的天然权利，甚至是相当一部分作家写作的驱动力和兴趣点，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只是有追求的写作者，大概不会安于这样类似于"写作癖"或满足"倾诉欲"的书写；而放弃自我经验，过于宏大高远的题材选择，常常又会沦陷在虚假、空洞和无力掌控的泥淖里；作为严肃文学的小说创作，相对边缘的文化地位，使其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拉开书斋的门，准备追求有社会影响力的写作，首先面对的是市场和资本对题材的挑选……写什么好呢？

题材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的写作，那个1932年提出的问题，在2013年的时候，还是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演化到今天，因为深刻复杂的社会转型，写作者的文化境遇和小说传播的方式、受众的构成等等因素，失去了沙汀和艾芜提问时的明晰，变得无比混沌。当然，我们今天的小说作者，只怕也失去了天真的提问热情——我们和我们的问题，混沌地纠缠着……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中国经验，即使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坐标系中来审视，它都是如此的复杂，令人惊讶。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变化过程，风驰电掣又风诡云谲，让人晕眩，难以理解和掌控，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人生记录下来都是跌宕起伏的故事，让虚构的小说为之失色。正因为如此，当下的中国经验是最值得文学去表达的人类经验。这是一个应该出现"大作品"的时代。然而中国的现实远远超越了中国的文学想象。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对这30多年中国经验的表达，的确不够充分，让人不大满足。我们今天的小说家，特别是和当年的沙汀一样年轻、生长在这个时代之中的小说作者们，似乎更加关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在世界中的位置，沉溺于个人经验的表达，不大关心是否对于时代"有配说得上贡献的意义"。

"丧失"或者说"放弃"沙汀们的题材意识，或许是当下年轻创作者有意为之的自觉选择，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不得不继承下来的"文学遗产"——对于作家创作个体性的强调，对于文学审美性和独立性的强调，是相当长时期内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束缚、控制和暴力之后产生的"反作用力"，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强。被政治绑架过的中国文学，即使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审美至上"、"个人主义光荣"同样也会演变成和"政治挂帅"一样的束缚和控制，虽然方向相反。极端的个人主义写作，带来了作家责任感的淡漠和题材范围狭窄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功利主义题材观决不可能拯救个人主义写作带来的题材困境。

有批评者把"小作品"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写作的文学表达囿于个人经验，因此对于书写个人经验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种针对题材的批评其实是把一个复杂的关乎小说创作的根本性问题简单化了。任何人的写作都离不开个人经验，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都是以个人经验为出发点和基础的。"能写的"首先是个人经验，而"想写的"则来自两个力量，一是文学理想，二是作家责任。"能写的"和"想写的"之间有错位、不对接，不只是沙汀和艾芜的问题，应该是绝大多数有追求的小说家命定要遇见的问题。如何使得两者之间顺利对接、弥合，最终合二为一，这是小说创作的根本性难题。从"能写的"走向"想写的"这个过程，其中间的难度和复杂性，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鲁迅对这一点应该有着充分的艺术自觉，因此，他严谨却又用心良苦地这样回答了沙汀和艾芜："……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鲁迅的回答，平实质朴却大有深意存焉，近乎禅门偈语。"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我认为这是对于题材问题至今尚未失效的回答，虽然，它只是修行的道路，而非明确的答案。从"能写的"中间严格选取可以深入开掘的题材，才有可能在"深"之后求得"广"，从"能写的"出发，最后抵达"想写的"——这只是一条可能的道路，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能走得通……影响它的因素太多了。正因为这样，关于题材问题，一种带着几分宿命色彩的论点始终盛行不衰：归根到底，一个作家只能写他能写的东西，而非他想写的东西。

这样的观点自有它片面的深刻性，作家禀赋的精神气质，的确具有个体差异和偶然性，题材选择与作家个体的精神气质，大多数时候是"顺者昌逆者亡"，选对了相得益彰，选不对两败俱伤。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作家为了拓展写作题材，下农村去矿山进部队，以种种形式"深入生活"却创作出了"粗浅作品"。这样的题材"宿命论"，它确实表达出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某些特殊规定性，违背艺术规律自然不会产生艺术杰作，然而艺术也在于克服困难。正如朱利安·巴恩斯说："一个作家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帮助他写出天赋范围内最好作品的那种生活。"那么，一个小说家最该拥有的题材意识，就是要选择最能帮助他的文学天赋充分发挥的题材。

选择帮助自己的文学天赋发挥到最高点的题材，不仅来自对自我精神气质的了解和对自我经验的重视，同时也来自于作家责任感的建立。虽然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个人写作背后依然有着深刻的责任，对文化、社会和文学本身的责任。作家愿意担负什么样的文化责任和如何认定自己的社会身份，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小说的题材选择，同时也决定了创作的高度和作品的意义。责任感驱使作家关注"大问题"，因为作家关注的人类精神层面不同，选大题材写出了小作品，选小题材却写出了大作品，题材的"相对论"现象，并非没有出现过。而在毫无责任感的真空里，任何人的文学天赋都只能无力地飘浮，而无法飞翔。

能帮助天赋飞翔的题材意识，不是鉴宝专家式的，给不同的题材贴上高下不等的市场估价标签；而是探矿者式的，脚踏实地，从自己的疆域出发，认真勘寻，深入挖掘，直到找到属于你的矿藏。即使你寻找的那条缝隙来自最为庸常的个人经验，未必不能最终产生震撼灵魂的大作品。《红楼梦》不是大题材，"儿女真情"、"繁华旧梦"是彻头彻尾的个人经验，然而这样的个人经验，经由小说家天才的文学叙事，从个人经验转变成为了时代经验、民族经验，以至人类经验。

电影《白鹿原》对原著角色的取舍

□罗 璠 文丽娟

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用洋洋洒洒50万言，在作品中着力刻画了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白灵等经典人物形象。如果探究这些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文化因子，不妨可用"士、农、工、商"等称谓指代他们。这些人物贯穿了从清王朝末代皇帝退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近半个世纪。作者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与吸附力，在作品中凸显了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文化基因，将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下的社会万象表现出来。其涉及时空跨度之广，故事结构之庞大，人物数量、性格、命运之繁杂，要将其改编成不到三个小时的电影，势必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矛盾冲突和极具典型的人物性格来表达。

《白鹿原》被影像化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仅就公映的版本看，影片最大限度地、相对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叙事骨架，尤其选择了以田小娥为核心人物，串联起白鹿两家形形色色的人物：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白孝文、黑娃、鹿兆鹏。这些人物中携带了丰富海量的文化信息：自由、欲望、背叛、宗法、官僚、革命、保守……这绝不是一场凡夫俗子眼中仅仅有关情欲的大戏，而是百年中国社会风云史的浓缩。

导演王全安将影片的时代背景定格在1912年－1938年之间，即清朝覆灭到抗日战争刚打响的这段历史。影片缩短了原著中的历史长度，以便更集中地叙述历史，其中，"烧粮"、"砸祠堂"等重要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均有呈现。电影用镜头刻画出了有着中国丰满的传统文化因子的人物形象：白嘉轩、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等人，其中白嘉轩、黑娃、鹿子霖三人可以分别作为农、工、商方面的表征性人物，但在原著中作者浓墨重彩描绘的"朱先生"却在电影中缺位了，电影忽略了原著中"士"这一重要因素。白嘉轩作为一个敬恭桑梓、服田力穑的农人，影片继承原著精神，将他的"农人族长"形象展现出来。影片通过对他坚决反对田小娥入祠堂这一场景的描述，展现了他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崇敬，对自己是儒家文化守护者这种身份的找寻和建构。然而他又过于固守且全盘接受儒家文化，以致在时代转型时期逐渐迷失了自我，用落后的宗法伦理秩序紧紧束缚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但他身上也保留着旧文化下农人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如注重内省和自律，为人低调等。而当时，在这种矛盾挣扎下的农人又何止白嘉轩一个。黑娃作为一个无产者形象，是交夹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牺牲品。他在一个向麦垛小便的场景中出场，这奠定了他作为一位反抗者角色的基调：早年闹农协、最终落草为寇（原著中讲述了他的最后回归），他不安于现状、不断与命运作斗争。一个为民族寻找出路的英雄形象在观众面前显现，但他始终没有走出中国时代发展的怪圈，直到影片最后也没有真正找到一条革命道路。他和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良者一样，一面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一面又难以接受新事物，认为只能从中国内在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出路，最终以悲剧收场。鹿子霖，从原著对他的描写来看，他的血统中流有商人的血液，鹿子霖和白嘉轩的对立掺杂了商业信念农业传统的竞争。影片中他想打破传统文化的禁锢，于是把辫子剪掉宣称革命，他与田福贤勾结鱼肉百姓，唆使田小娥诱骗白孝文，使族长白嘉轩丧失颜面和权威，又阳奉阴违地与白嘉轩称兄道弟，这些表现具有中国传统商人形象的典型特征。

导演在电影中展示给观众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读，仅从"农、工、商"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忽略了原著中关于"士"形象的表现。原著中，代表着"士"这一形象的便是"朱先生"。陈忠实说，他小说里的人物除了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他人纯属虚构。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无论"入世"或"出世"，他都以一颗平静的心处之，并散发出儒者的智慧和圣人的光辉，仿若白鹿原上百姓信仰的寄托——"白鹿"。以致当白嘉轩追忆此人时感叹"朱先生一生全都是与人为善，竟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情来"。他完美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位不求回报的"士"者形象，正是陈忠实和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肯定。作为一部叙述"民族秘史"的改编电影，理应把原著中蕴含的中国时代的基本格局和价值定位展现在影片中，但导演忽视了这一点，将"士"这一基因舍弃。或许影片时长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但作为一种再创造的改编，最好还是不要流失了原著的思想内涵。在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下，"士、农、工、商"的结构始终保持着稳定性。原著《白鹿原》表达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时代向现代文明转型期间各层文化因子的命运浮沉，展示了传统"士、农、工、商"内在的相互关系，让读者对这一时期有了整体感知。影片中没有了"朱先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解读，白嘉轩对于儒家传统的固守便显得生硬，没有了"朱先生"这一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独立与完整的人物形象，这部"民族秘史"便丧失了厚重感。和"士"族承担的文化信仰一般，"朱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刀枪折戟的力量，但就是因了这种信仰，民族便有了一个支撑点，国家便能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而现在，"朱先生"的消失，不仅在影片中消逝了那份人们对于"白鹿"的信仰，让乡土精神生态的平衡木失衡，让白鹿原失去了灵性，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士、农、工、商"这层稳定的结构，使影片终不够丰满，使观众体会不到传统"士"族隐现的精神力量，不免让影片留下很大的缺憾。

沈从文带给我们多方面的文化财富

——"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进一步研讨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成就、文化地位、学术价值，值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和吉首大学沈从文纪念馆开馆之际，由吉首大学、湖南省凤凰县政府、湖南省花垣县政府于2012年12月26日至28日联合举办了"沈从文纪念馆开馆暨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沈从文研究专家、学者、学术刊物编辑以及作家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沈从文的独特性及其表现、独特性产生的原因以及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延伸、沈从文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拓展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对沈从文的认识与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是研讨的基础问题，与会代表比较一致地认为，沈从文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沈从文的文学成就，还包括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成就。与会代表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沈从文研究的范围也由文学研究延伸到了物质文化史研究，标志着沈从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全面拓展与全面深化。凌宇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整体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王继志认为，沈从文的伟大，体现在多个方面，沈从文是中国形象的文化标签。向成国认为，沈从文文学作品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成为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沈从文值得我们永远的尊敬，他的作品和文化史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吴子林提出，沈从文的诗性创作，让我们真正地理解了人本身，也让我们学会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具有很高的人类学价值。杨瑞仁从沈从文乡土创作角度解释了沈从文的文化意义，他认为沈从文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原因在于沈从文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至少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是"乡土文学巨匠"。安刚强则从文学本体这个角度来探讨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他认为沈从文的文学遗产的珍贵价值在于诚挚的人民立场、亲切的乡土关怀、沉郁的文化忧患、热烈的生命意识、丰富的抒情诗学、温煦的人格质素等。

此次研讨会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于"沈从文形象史学思想"的提出与初步的阐述。赵连赏从沈从文的文化史研究成果角度，全面总结了沈从文的文化史研究学术思想体系，认为沈从文是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形象史学"研究方法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辩证唯物主义是沈从文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沈从文善于研究观察以及处理文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其二，调查、探索、不断开拓，面向文物事实本身，这是沈从文学术思想的实践基础，也是沈从文学术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三，沈从文的"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其文物研究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将文物的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达成和文献的高度结合。事实上沈从文是"二重证据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其四，学以致用是沈从文学术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之，正确的指导思想、实践第一的工作理念、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学以致用的学术情操，共同构筑了沈从文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思想体系。

在谈到沈从文的独特性及其形成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沈从文能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原因，在于其文学创作思想特立独行，在地域、民族的特殊性与人性表达的普适性之间形成了有机的统一性，在艺术创作风格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形成了高度的融合性。吴投文认为，沈从文艺术独特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独特性，沈从文将丰富的人生内容、深沉的人文情怀、独立的艺术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浓厚的人文气质与独特文化个性的美学形态，所以沈从文的美学思想是一种以人性美学与生命美学为基本理论内核的艺术美学，也是一种追求艺术澄明之境和人生艺术化的中和美学。何小平则从民族志书写角度来阐述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认为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民族志特征与民族志写作中的诗学特征的结合是沈从文文化思想、审美思想与艺术思想及其表达在中国现代独立特行的重要原因。研讨会内容还包括了沈从文的独特诗性叙事方式和独特的感性思维范式等问题。刘志华认为，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主要采用诗性叙事方式。沈从文把诗性话语作为文本建构的策略，小说呈现出忧郁的诗意，形式单纯而优雅，但内涵丰富，为一种独特的诗性形态。沈从文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上，唐东堰认为，沈从文并不擅长理性思辨，其思维永远是一种避开具体认知程序，直接与本体对面的东方哲人的认知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其创作和思想除了可言说、可思辨的层面外，还存在一个依靠体悟建构的"超言说"层面。若只从"逻辑—理性"层面来考察沈从文的创作与思想，就不能揭示出其创作与思想的全貌。李美容从审美现代性批评角度对沈从文的艺术价值的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沈从文站在审美现代性立场，通过构筑一个诗意的、感性的、自然的审美世界，对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现代启蒙作家的设定与安排。研讨会还讨论了沈从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独特性问题。林铁认为，沈从文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中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对于沈从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研究，应该从厘清现代性、中国现代性、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内涵入手，结合沈从文的文论文本，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方面阐发沈从文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研讨会对于沈从文独特性形成的原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沈从文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思想与文化理解、阐释视域的问题上。与会代表对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审美思想与文化思想的动态发展性持一致的观点。沈从文独特性形成来源于他复杂的文化接受状况。罗宗宇从湘西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沈从文文化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他认为，湘西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成就了沈从文，也成就了沈从文的艺术创作。周仁政也同样认为，湘西作为古楚文化的遗留之地，其中重要的文化元素——楚巫觋文化对沈从文的艺术思想和审美思想影响至深。沈从文的独特性表现之一在于他的自然性，白玉兰认为，沈从文作为自然赤子，从小就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融入广阔的自然，虽然没能像其他作家那样接受良好的学历教育，但这并没影响他对美与自然的良好感悟。何圣伦认为，沈从文有一种苗文化的自觉意识，湘西苗文化对其文学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罗维则从沈从文的社会交往角度，阐述了沈从文文化精神和性格的形成情况。

与会代表表示，沈从文的伟大，在于他不但用诗性的形式为人类提供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用他无比卓越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给人类贡献出了极为杰出的智慧成果，所有这些，使得人类的精神家园增添了更多的温暖，使人类多了些许憧憬和期待；沈从文的伟大，更在于沈从文刚强而充满韧性、谦卑而又充满尊严的人格犹如永不熄灭的灯熠熠生辉，烛照前行的人类。

（何小平）

广 告

中華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3年第一期

本刊特稿 讲故事的人……莫 言

小 说 长篇 新恋爱时代（作家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王海鸰

作家自由谈……王海鸰

中篇 繁枝（原载《人民文学》）……陈 谦

西雁河（原载《北京文学》）……陈 河

短篇 找不着北（原载《上海文学》）……刘庆邦

紫霞湖（原载《钟山》）……叶兆言

我爱你（原载《作家》）……高 君

名家散文 会唱歌的墙（原载《文艺报》）……莫 言

莫言和杨振宁和一只幸运的茶几（原载《中国文化报》）……陈祖芬

佳作点评……本刊编辑部

一年选载 12部长篇 24部中篇 36部短篇

畅销时代的文学读本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作品 上半月刊

二〇一三年第一期（总第六百一十五期）要目

■百家之言 谈谈作品……曾镇南

■金 小 说 倚天屠龙记……朱旻鸢

表姐的诊所……徐 岩

南方……刘 汀

急救中心……伊 沙

■浪潮1990 一朵男孩……周 恺

对手……李 唐

■玉 散 文 大学春秋……张同吾

马六甲：历尽沧桑的美丽风情……吴赤锋

潮州有座三王庙（外一篇）……邱喜桂

■银 诗 歌 手表：父亲的遗赠（每月推介）……寒 烟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三……孙文波

草原的启迪（外三首）……黄惠波

幸福的感觉（外三首）……王正洪

鱼之惑（组诗）……艾 茗

■"广东精神赞"诗词赋全省征文

名誉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zp2001@21cn.com。

中国诗歌 主编：阎 志

——2012民刊诗选 2012年第十二卷要目

头条诗人 灵魂挽歌（组诗）……潇 潇

特别推荐·十大民刊作品选

孙立本 李广平 江 晨 洪 峰 道 辉

林小妮 旱 子 旗 烈 甲 子 荫丽娟

康 宁 周凌云 张 洁 苏微凉 东方明

李扬舟 俄狄小丰 阿索拉毅 王国清 董迎春

陈小羊等

民刊诗选

知 闲 余子愚 薛向荣 阿 翔 苏建斌

鱼小玄 艾傈木诺 纳兰容若 朵 渔 唐军林

小 染 周 琦 亚 夫 蓝 蓓 顾金良

张乾东 红 莲 汤养宗 陈 亮 安文海等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元，免收邮费。电话：027—61882316。投稿信箱：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

小说月报

2013年第一期目录

中篇小说

夏天……张 翎

同学会……张 者

西雁河……陈 河

最后一个匪徒……王秀梅

短篇小说

心理治疗师……姚鄂梅

操场……（壮族）凡一平

胡不归……笛 安

荞花的月亮……（回族）马金莲

良宵……张 楚

麦女……补 丁

报刊小说选目